

目次

论文

平台企业的灵活积累机制

——一个合约理论的视角 滕飞(1)

信息逆差:代码权力膨胀与公众权力让渡 施颖婕(21)

大语言模型能用来给主题模型中的主题编码吗?

——兼论大语言模型在社会科学领域应用的前景

..... 李代 张博伦 周浥莽(33)

数字时代的科技公司与国家治理

——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 钟瑞雪(60)

新闻大数据视角下测度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新路径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李军 董方杰(84)

解密数字社会中的幸福密码

——不同互联网使用程度下社会信任感和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机制研究 郭媛媛 张腾(103)

研究报告

- 数字时代安全科技价值报告 …… 陆菲菲 秦昊 张友红 吕鹏(133)
- 问题触发的算法模型响应机制探索 …… 许正军 袁岳(153)

译文

数字健康的社会技术伦理

——生命伦理学进路的批判和延伸

…… 詹姆斯·肖 约瑟夫·多尼娅 著 何丽 译(166)

书评

数字资本主义和智能技术的当代批判

——评《过度智能》 …… 周银知(186)

访谈

通过人类行动思考机器智能

——专访人类学家露西·萨奇曼 …… 露西·萨奇曼 胡万亨(198)

CONTENTS

THESIS

The Flexible Accumulation Mechanism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A Contract Theory Perspective	Teng Fei(1)
“Information Deficit”: Code Power Inflation and Public Power Cession ...	Shi Yingjie(21)
Can LLM Label Topics from A Topic Model: The Future of LLM in Social Science	Li Dai, Zhang Bolun, Zhou Yimang(33)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Age: A Comprehens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Zhong Ruixue(60)
A New Approach to Measur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Data in News: A Case Stud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	Li Jun, Dong Fangjie(84)
Decrypting the Happiness Code in the Digital Society: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ocial Trust and Fairness Perception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under Different Internet Usage Levels	Guo Yuanyuan, Zhang Teng(103)

RESEARCH REPORTS

Report on the Value of Security Technology in the Digital Age	Lu Feifei, Qin Hao, Zhang Youhong, Lyu Peng(133)
Exploration of Algorithmic Model Response Mechanisms for Problem Triggering	Xu Zhengjun, Yuan Yue(153)

TRANSLATED TEXT

The Sociotechnical Ethics of Digital Health: A Critique and Extension of Approaches from

Bioethics written by J. Shaw, J. Donia; trans. by He Li(166)

BOOK REVIEW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Digital Capitalism and Smart Technologies: Review of *Too*

Smart Zhou Yinzhi(186)

INTERVIEW

Thinking Machine Intelligence Through Human Actions: An Interview with Anthropologist

L. Suchman L. Suchman, Hu Wanheng(198)

数字资本主义和智能技术的当代批判

——评《过度智能》

周银知^{*}

摘要:人类正处于探索数字化道路的险途,数字化和智能化成为数字时代的典型特征,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捕获了个体、家庭和城市,数据成为一种商业模式。美国青年学者贾森·萨多夫斯基新著《过度智能》从政治学和哲学角度,对当前数字资本主义和智能技术的发展进行了犀利批判,指出了技术由谁主导、为谁服务的权力和利益问题,凝结了作者对理解、对抗和挑战西方技术政治体系的深刻观察。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 智能技术 技术政治

当今,对数字资本主义与智能技术议题的讨论热火朝天。人类正处于探索数字化道路的险途,数字化和智能化成为数字时代的典型特征,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捕获了个体、家庭和城市,数据成为一种商业模式。美国青年学者贾森·萨多夫斯基(J. Sadowski)新著《过度智能》于2020年付梓,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副研究员徐琦于2022年将其翻译引介至国内。正如作者在“余论”中所言,他在书中展示了智能社会的隐秘危害以及危害是如何扩散和日益严重的,此书正是他不遗余力地对现有秩序所做的批判(萨多夫斯基,2022:233)。

《过度智能》从政治学和哲学角度对当前数字资本主义和智能技术的发展进行了犀利批判,指出了技术由谁主导、为谁服务的权力和利益问题,凝结了作者对理解、对抗和挑战西方技术政治体系的深刻观察,是我们了解数字资本主义政治体系运作机制的一本很好的参考书。基于此,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梳理《过度智能》每个篇章的主要内容和观点;第二部分以书中的部分核心观点为

^{*} 周银知,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支撑,深入分析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型剥削和控制形态并对此展开批判;第三部分梳理学术界对技术的批判理路,并与书中的观点展开对话,进一步挖掘书中的深层次内涵和逻辑;第四部分结合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对作者解构资本的新范式所提出的路径进行评析和借鉴。

一、数字资本主义的要务:收集与控制

《过度智能》一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第1—3章)主要为数字资本主义的理论问题,探讨数据的收集、控制和资本化;第二部分(第4—6章)分别探讨了规模递进的三种智能场域,即智能自我、智能家居、智能城市的发展和问题;第三部分(第7章)是在上述两个部分对智能技术的资本进行解构之后,提出建构方式和可能的现实路径。

第1章“数据世界”指明,数据作为资本形式被收集、应用和生产出来,成为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要素。数据已然成为公司经营的重要商业模式,甚至各个行业都将数据化作为主要的业务予以推进。数据价值体现为可用于分析和追踪定位、优化系统、管理事务、建立概率模型、制造产品、实现资产增值等。智能技术一方面成为制造数据世界的手段,另一方面也依赖源源不断的数据以保持更新和运转。数字资本主义通过对所有人和所有物尽可能多地持续性收集数据,创建起了监视、管理和控制人的社会系统。

第2章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种权力形态:武力、规训和控制。作者认为,武力在封建社会体现为王权和君权,而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更为普遍地体现为警察、父母等角色掌握的威胁和惩罚的权力(萨多夫斯基,2022:48)。在此,武力可以作为权力的第一等级。“规训”是福柯(M. Foucault)提出的概念,与资产阶级的发展密切相关。它倡导特定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使得人们将这些信条、习惯和规范内化。在这种形态下,权力便决定了如何规训、建立何种规训制度和方式,这是对人的生命权利的技术运用。因此,规训更为高级,可以作为权力的第二等级。控制被作为权力的第三等级,作者认为,控制不是用暴力威胁人们,也不是用规训的方式来塑造人们,而是通过设定参数和建立检查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和发挥作用,人们往往感受不到所处的控制系统(萨

多夫斯基,2022:49),其象征便是计算机网络。德勒兹(G. Deleuze)的控制理论对理解智能技术系统的运转及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在万物互联的社会中,智能技术的根茎已经遍布整个社会,并不断复制和蔓延。数据世界中的每一个体都是自我的“分体”,即独立的个体被分解为身体、行为、身份、特征、事件等部分而分别存在。人们如果想进入各类软件系统,就需要通过用户许可协议,提供自身的数据,比如密码、面部特征、指纹等。在现实生活中,这三种权力形态交织、融合和共生,共同形成了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支配系统。第1—2章说明,智能技术的发展是由数字资本主义的收集、控制两大要务所驱动的。换言之,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依托于智能技术发展,对所有人和所有物进行数据收集,并对所有人和所有物实施控制。

第3章论述了数字资本主义运转中的十大论题。作者认为,数据化和数据收集意味着盗窃和暴力,其关键在于如何使用抽象化了的人的身体、行为和事件的数据,使用过程中的目标设定、价值选择和利益考量体现了数字资本的偏见与剥削性(萨多夫斯基,2022:76)。例如,大型互联网平台实际上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新房东”,用户则通过默认平台许可协议和放弃个人数据所有权来支付“租金”,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被转移至平台;技术官僚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一种“解决主义”,将世界上的问题看作有待技术解决的问题,只要技术提供了合理化的解决方案,世界便可以按照技术设计的图景来创造。

第4—6章中,作者通过现实生活的丰富案例描述了智能技术对个体自我、家庭生活空间和城市空间的把握与控制(萨多夫斯基,2022:15)。涉及的问题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控制权力问题,即谁拥有数据和实施控制行为,这涉及为谁服务的利益之争,技术的掌舵者或将成为权力的拥有者;二是处在超级全景监狱下的人的生存境遇,被数据捕获的个体自我、家庭生活空间和城市空间最终成为技术的控制物;三是数字编码体系中的公平、民主和隐私问题等凸显。这三章集合了作者对当前智能社会三大主体场域的现实揭露和尖锐批判。

第7章集中论述了作者提出的新建构方式,包括“离经叛道”地废止那些没有实际改善生活和造福社会的技术、使创新过程民主化、进行数据监管和数据集体化。作者使用牛顿第三定律的隐喻来表明其反对技术垄断的信心(萨多夫斯基,2022:201)。牛顿第三定律指出: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大

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作者借此表示反对技术政治统治的集体行动作为反作用力正在形成团结和批判的力量,其力量的强度和影响力有望与技术霸权和技术垄断的作用力相匹敌。

在资本适应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作者对数字资本主义和智能技术所要实现的收集与控制两大要务的观察深入现实、切中肯綮。他认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创新精神让智能技术日臻完善,实现了对个体、家庭和城市等所有人和所有物的抽象化、数据化和再编码。我们确实是在生活和工作中已经感受到了这样的现实,即人的方方面面无不被数据化,也无时无刻不被数据所引导和控制。同时,该书鲜明地提出了技术政治问题,将问题的实质直指谁控制技术和数据、为谁服务、为何如此的根本性问题。智能技术问题首先应该是政治经济问题,应当关注技术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作者由此揭示了美国的技术政治现实。因此,该书的意义不仅在于传递了对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学术之思,还在于对“批判的武器”的应用和发挥,书中大量的案例分析也反映了作者对学术源于现实并观照现实的期盼。智能技术已经成为全球发展趋势,与我们大家息息相关。在这样的现实和语境下,探讨智能技术发展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不仅是直面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压迫和剥削问题,更是关于人与技术之间以及未来社会的理想图景的根本性问题。作者尽力对数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进行批判,揭露智能社会隐秘的技术政治体系真相,并积极建构干预、对抗和挑战技术政治体系的路径。

二、数字资本主义：“新房东”和“分体”

“数字资本主义”是一个宽泛的用语,作者在这里主要指向数字技术适应资本化运作从而产生对智能技术的创新驱动,以及数据作为资本要素被资本化的现象。作者鲜明指出,平台就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新房东”,并在书中给出了“智能”的定义,即“智能”意味着一个物体被嵌入了用于数据收集、网络连接和增强控制的数字技术,这显示了数字资本主义和智能技术中新的剥削形式和控制路径(萨多夫斯基,2022:2)。数字资本主义的“新房东”指当代众多行业的大型互联网平台,它们真正收取的“租金”不仅包含直观上的“软件即服务”的业务收入,还体现为掌握了由海量用户产生的数据的所有权。其中,前者以后者源源不

断的数据输入为基础来保持运转,后者实际上成为平台的源头活水。因此,影响“新房东”“租金”收入的关键因素是数据的来源问题,只要平台掌握了持续的活跃数据,软件服务和数据再编码便拥有了稳定的动力。

具体来说,“新房东”的概念体现了作者对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两大要点。一是以饱含正义的谴责之态深刻揭示了数字平台的剥削性,作者用“阴险”“暴力”“排挤”“榨取”“盗窃”这类富有情感的词描述资本化的数字运作,将智能技术的应用作为环境的产物,强调层层代码之下隐藏的是一系列的偏见、规范和假设。数字平台收集数据忽视了或简化了用户知情权和补偿权的问题,这是对用户个人信息和用户多元数据的偷窃。“新房东”与传统房东都是食利者,不同的是随着商业模式的更新,“新房东”不再对所有权收费,而是通过搭建“共享”“服务”的数字平台建立自由和平等的幻象,通过用户许可协议、软件许可协议等方式享有软件及其产生的数据的所有权。由于用户许可协议通常是规范性和强制性的,用户只有默认或同意协议才能够使用相关软件和硬件,因此平台便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对软件进行访问、控制和提取数据的合理权利。实际上,平台冠以“分享”“互联”之名,却将用户置于不公平、不合理和丧失所有权的境地。正如其他学者所言:“数字资本主义凭借数据和平台,不仅维持和延续了已有的竞争优势和垄断地位,而且通过营造一种自由参与、民主双赢和信息共享的氛围实现更隐蔽的资本增殖和更深层的劳动盘剥。”(叶泽雄、鄢然,2023)这些观点在学界已成为共识。往前一步,数字平台用户的劳动在“新房东”语境下获得了类似农民在土地上耕种般的根基,即用户在数字平台这块土地上进行的信息、注意力、数据等耕作理当被视为数字劳动的一种形态,应当给予劳动肯定。这为我们辨析数字劳动的资本逻辑和用户劳动的非正义性提供了有益观点。

二是直言技术的政治性。“新房东”简洁透彻地指明了数字平台资本相较于封建社会在当今数字社会性质不变的剥削特征,剥削的背后是政治的角逐。作者认为,互联网平台形成的数据信息和数据系统以第三者的视角突出了其公平、客观和中立的特性,掩盖了数据收集、设计和运用中的目标设定、价值观、利益、制度等属人的主观性因素(萨多夫斯基,2022:105)。在此,值得追问和质疑的问题是:数据是客观和中立的吗?数据是衡量我们行为的标准吗?作者警示到,智能社会的建构是一项政治项目,是关于人们想象力的战争(萨多夫斯基,

2022:87)。蓝江认为:“我们通过数字之门,通过一个注册的身份,成为资本主义数据猎手的猎物,我们在虚无的浏览和刷屏中,不仅让自己脱离于大地,也让自己成为数字社会资本主义机器的一部分。”(蓝江,2023)事实上,大型互联网平台凭借强大的规模优势和行业主导地位,在对人们的行为引导、修正、规范和控制上起着无法抗拒的作用。个体往往将平台作为独立第三方来看待,忽视了平台所呈现的结果并非对世界的正确反映和判断。我们需要对数据和信息的完整性与真实性持批判的态度,至少不是完全被数据系统决定什么是正确的、好的、有价值的和值得追求的。这对反思数字平台带有的意识形态欺骗性、智能技术的社会建构和政治性具有强烈的启示意义,而且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中,怎么强调技术的政治性都不为过,这反而对数字技术的设计、开发和应用等环节的政治性实质进行了理性的揭露。

除此之外,作者论述的“分体”思想是上述“新房东”概念的重要理论支撑。构成“新房东”的“租客”是每个个体或被部分化的“分体”,组成“新房东”进行生产的要素是个体或“分体”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具有实质内容的数据和信息,使得“新房东”贯彻实施精细化微观管理成为可能的便是数据最大化原则之下“分体”式的存在。个体不断被“分体”化、原子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平台实施数据最大化原则的有效方式和必然结果。数据采集将人们的不同属性和行为作为收集目标,智能技术便会实现从周围环境中剥离出来提取特定要素来完成数据收集的任务。独立的个体不断被身体、行为、事件等部分数据“分体”化,作为不连续的、分散的、部分的“分体”存在于数字世界中。同时,智能技术也增强了通过属性、行为或类别来代表一个个体的能力。个体是复杂、矛盾和动态的存在,抽象、分解、提取便成为理解人、改变人和控制人的高效方式。这导致的严重后果便是数字围场中微观管理至死,即基于对人们各方面数据最大化的收集进而实现微观层面的极致控制。数据的爆炸式增长和使用,强化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的绩效管理思想。随着对个体、城市和社会层面数据收集、分析、储存和运用的能力不断加强,公司、政府和社会获取的信息越来越多,便越有可能去建立有效的量化标准和指标,不断改进和完善工作流程、供应链管理甚至城市建设。在此,可以将个体、城市、社会在数据中的“分体”式存在看作在智能社会中进行微观化管理的理论深思和现实依据。

在实践层面,“分体”式存在也为微观管理在智能社会中的实施提供了可行的思路和方案。数据化的个体以“分体”式存在,并被分析活动进行审视、检查、评估。作者指出,数据代理商最大化收集所有人的数据和信息,将其细分为不同的市场,进行标签化、分类化处理,并提供信用评级服务(萨多夫斯基,2022:103)。例如,保险公司会根据人们的信用卡消费记录、健身会员卡资格和健身次数等决定保费。微观管理不仅体现在对个体的评分、分类上,也体现在城市和社会层面的微观控制上。尤其是,遥感技术、互联网、计算机技术、算法和算力的发展让整个城市都处于监控器的视觉范围内。所有人、所有物均以数据化的形式部分地存于数据系统之中,管理者也借助数据系统建构、影响和改变代表个体的“分体”式存在。

那么,值得深思的是:被智能技术数据化和“分体”化的人能否代表真正的人?这种做法是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审视人的,是以什么样的世界观来构序世界的?作者指出,抽象化的数据能够形成对世界排序和建构的强大力量,这种探知世界特征和动态的方式能够使世界分类化、规范化、清晰化,但排除了审视世界的其他方式(萨多夫斯基,2022:75)。正如彼得·施莱弗斯(P. Schryvers)对数字时代数据爆炸式增长后出现的数据陷阱的警示:“数字革命创造了一种信息狂妄。聚光灯越集中在这个世界可测量的部分上,我们就越相信我们无法测量的部分不再存在。”(施莱弗斯,2023:IX)在此,作者关注的是社会围绕数据驱动系统的组织方式,而非关于数据化、抽象化的道德问题。例如,对智能自我最关键的影响在于他人如何使用、为了谁的利益使用自己的数据。领域感知系统和持续监控系统可以实时跟踪城市中的任何人和任何地点,任何个体、家庭、组织、行为、事件的画像都可以通过数据驱动系统得到。这时,城市便被数字技术之网捕获,决定城市生存与发展的权力被掌握在数字技术和数据所有者的手中。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未谈及人的精神特性和社会关系性,未指出数据人和个体的本质不同,也未对人性进行具体分析。实际上,人是具有精神性的存在,精神和思想恰恰是无法通过数据精确衡量的变量。除此之外,现实的人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和处于各类社会关系下的存在,以数据来衡量个体强化了人对自我的机械认识,淹没了人之为人的思想特性和价值理性。人应是目的而非手段。这类人文情怀的呐喊和伸张,作者并未赋予笔墨,而是将其作为批判的理论前提

和情怀之基,以便重点关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运行机制和现实。因此,从批判的现实性上看,作者并未过多游走在乌托邦式的遐思中。

整体而言,《过度智能》一书中对数字资本主义、互联网平台经济、数字系统的控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尖锐的批判。“新房东”和“分体”互为补充,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基石,并为理解数字劳动、数字泰勒主义、数据人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启示。

三、技术批判的理路:技术、资本和政治

纵观人类历史,技术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进步紧密相关。每一次技术的巨大跃迁都塑造了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对技术的反思、批判和完善一直是人类社会和人文学者关注的话题。因此,有必要梳理技术批判的理路,并将《过度智能》中对智能技术的批判与其进行对话,以期挖掘更深层次的内涵。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对技术进行了辩证论述:一方面,他认为技术作为物质生产的重要力量,是人获得自由必不可少的进步要素和手段;另一方面,他对技术进行了批判,并在《资本论》中对机器技术对工人的损害进行了揭露,认为“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马克思、恩格斯,1975:463)。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生产方式的革新,进而造成社会关系的更新和变革。某种程度上,工人和技术之间的对立正是技术异化的必然结果。在劳动异化的进程中,技术不断被资本化。换言之,技术转变为资本扩张的动力和工具。技术的资本性利用和展开是造成劳动异化的原因之一,也是马克思对19世纪技术复杂性的揭示。

在21世纪的智能社会,技术的资本化是否在加速推进、变得更加深刻?作者声明,此书是关于政治、权力和利益的书,它们是技术的构成部分,并且也被技术所引导和改变(萨多夫斯基,2022:5)。毫无疑问,技术的资本化作为社会建

构的因素内含其中。不过,作者在这里使用了“利益”一词来解释技术的资本化,即技术实质上是实现利益的一种方式(萨多夫斯基,2022:6),比如少数人的利益、某些平台资本家的利益。因为技术并非自我决定的,而是由人们做出的各种选择的结果,所以人们行动的利益考虑、动机、原则等因素是否公平,维护的是哪方的利益便成为值得深究的问题。事实是,智能技术往往由少数人参与和制定,技术构建中存在着一定的寡头政治现象。这种现象往往被提供快捷服务的APP和网站所掩盖,算法、互联网带给用户的沉浸式体验淡化、弱化了人们对技术背后的政治性和利益性的关注。作者并未深究技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支撑,似乎是将技术的资本化作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默认的理论依据,关注的是技术政治化以及技术背后的利益受众、组织和价值等现实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传统,在20世纪20—60年代对技术“经历了一个从意识形态的分析与批判,到心理机制的分析与批判,再到对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的分析与批判过程”(王振林,2021)。例如,不同于马克思以商品为出发点,从交换价值分析人与物的关系,注重资本对生产逻辑控制的批判,鲍德里亚(J. Baudrillard)以符号编码为出发点,从文化角度、物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分析消费行为和消费异化,展开了对消费的社会性批判。鲍德里亚指出:“消费是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的纪律来驯化他们;这不是通过取消便利,而相反是让他们进入游戏规则。这样,消费才能只身取代一切意识形态,并同时只身承担起使整个社会一体化的重任,就像原始社会的等级或宗教礼仪所做到的那样。”(鲍德里亚,2000:90)马尔库塞(H. Marcuse)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明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欺骗,认为“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马尔库塞,2008:9),而“这种技术秩序还包含着政治上和知识上的协调,这是一种可悲而又有前途的发展”(马尔库塞,2008:3),在技术主导的极权主义社会中产生着丧失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单向度的人。在此,法兰克福学派默认了技术的建构性以及资本化,同时带来的新命题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控制形式不断更迭,程度日益加剧。无论是消费社会的符号价值,还是虚假需要的制造,都是技术支配人们、操控社会秩序的手段和方式。

那么,21世纪的智能社会是否日益被技术所控制?如果是的话,是借助什

么样的工具实现的？其形式呈现出什么样的新特点？作者认为，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日益控制了个体自我、家庭生活空间和城市空间这三大主体场域。例如，上文论述的分体和微观管理思想呈现了数据驱动的系统决定和改变了自我的评级、价值和认知，自我不知情地深陷其中且无法凭一己之力摆脱技术控制。智能技术通过数据最大化原则，尽可能地收集所有人、所有物的数据，实现了数据和算法驱动下的控制，结果便是技术所有者的权力更广和更集中。或许，智能社会中的微观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威胁、算法规训和大数据控制这三种权力的集合。

总而言之，从观照技术批判的理路中可以看到，作者认为智能技术一直起到了充实和赋能资本的作用，并通过数字平台、大数据技术实现了对个体、家庭和社会的微观控制和管理。更进一步，作者揭示了智能技术背后的政治和利益问题，即数字技术以提取所有人、所有物的数据并进行控制为要务，促进的是技术官僚和寡头的利益，损坏和凌驾了人类的民主、自治和公共利益。这为将政治纳入智能技术的构成部分，理解智能技术发展的政治性，提供了深刻和细致的批判范式。

四、批判之光与解构之行

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够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恩格斯，2012：9—10）能够切中要害、针砭时弊的理论，是引领人们进行精神革命的力量。《过度智能》一书是对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中有关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民众生活、智能技术发展等多方面的综合性审视，运用大量案例将技术纳入社会的多元因素中予以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通往社会不平等、经济不稳定和生存不安全的黑暗面，并试图建构基于批判之上的新范式来为改变现实状况点燃亮光，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和建设性的路径，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理论与实践的沟壑，这也为处于数字化建设中的中国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一方面，技术创新民主化解决的是主体性问题，是从技术创新的主体参与设定上来实现技术为民所用。创新是少数人的专利吗？普通人也可以有知识和能

力做出创新吗?作者特意重申“卢卡斯计划”,意在提醒普通人拥有的智慧与力量,反对将创新神秘化和天才化。真正参与式的设计,必须从制度、监管、流程、能力等多方面来保障多元主体参与到技术的价值观、目标、生产方式等的设定和决策中去。另一方面,相较于数据监管这一常规性操作,作者更强调数据集体化的重要性。社会中每个成员的数据现已成为企业、经济、社会运行的基础要素之一,而数据的所有权却为个别企业所有,数据产品的私有化与生产数据的社会化正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根本症结。作者鲜明指出:我们如何使数据治理变得更加民主?答案是去商品化和集体化,成立专门的数据管理机构,让数据出于公共利益而被集体拥有,真正实现造福于人的宗旨(萨多夫斯基,2022:226)。

技术是由社会所建构的,与一国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法律政策等密切相关,以大数据、互联网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智能技术更是人类社会自身的产物。换言之,审视技术也是在反观人类社会自身,批判技术的负面作用也是在反省人类社会存在的问题。批判的维度始终应当是人类和社会不可或缺的特性,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单向度、封闭式思维及话语的批判,强调理解、反抗、挑战现存事物才能有改善它的空间,因为允许矛盾的存在才会保存张力的空间。智能技术正在飞速发展,其普遍应用的后果和影响深不可测且无法完全把握。《过度智能》一书坚守了社会批判理论的传统,对发展势如破竹的智能技术敲响了警钟。

批判之光照映在解构之行上,作者所提倡的方案对于中国来说也具有较大幅度的借鉴意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所强调的‘规模、共同、协调、和谐、发展’等内涵,与数字经济所蕴含的‘普惠、平等、协作、共享、开放’等特征具有内在一致性”(刘颖、黄朝椿、洪永淼等,2023)。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需要汇聚多元主体的智慧和力量,脚踏实地地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综上所述,一方面,《过度智能》一书揭示了美国技术政治体系的权力不平等问题,以及数字资本主义驱动下智能技术凌驾于普通民众、服务于少数精英的异化之实;另一方面,借助大量案例分析,作者现实化、具体化了对智能技术的影响,为具体设计、制造、应用技术提供了批判思维路径。但是,在解构的现实之行上,智能技术数据集体化这一建议在操作上条件尚未成熟,如何采取更有效的措

施来使技术发挥造福于人的积极作用依然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 鲍德里亚,2000,《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蓝江,2023,《数字焦土和剩余数据——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人的生存》,《求索》第1期。
- 刘颖、黄朝椿、洪永森等,2023,《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刊》第10期。
- 马尔库塞,2008,《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19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2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萨多夫斯基,2022,《过度智能》,徐琦译,北京:中译出版社。
- 施莱弗斯,2023,《为什么数据会说谎:被忽视的衡量指标》,张羿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 王振林,2021,《一种时代的批判意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期。
- 叶泽雄、鄢然,2023,《批判与超越: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检视》,《理论月刊》第5期。